

略论五代使职官的几个特征

李 军

(首都师范大学,北京:100037)

摘要:使职官在五代产生新特点;枢密使、三司使在政治、经济体制中取得核心地位;内诸司使多由士人充任,并出现阶官化趋势;部分在唐朝业已消失的使职重新恢复;部分使职可兼领外职,这加剧了它们本身职能的衰亡。这些新特点影响到北宋的政治、经济格局。

关键词:五代;使职官;枢密使;三司使;阶官化。

中图分类号:K243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3370(2003)03-0081-04

使职官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,它作为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“研究史事者必不容不究心”。^{[1](P651)}而“五季承唐以后,虽兵戈相寻,然去唐未远,制度典章,人犹得以持循。”^{[2](卷五)}使职官作为典章制度的独特组成部分,亦得以承继其余荫,并在五代独特繁杂的政治环境中产生了与唐代不同的模式和特点,影响着五代乃至北宋的政治和经济的格局。

产生于唐代宗永泰年间的枢密使,到五代时权力已经空前膨胀。清代学者王鸣盛说,“三省长官皆宰相,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,后又移其权于翰林学士,五代又移其权于枢密使,宰相如不兼枢密使者但空有相名耳。”^{[3](卷九十五)}永泰年间初置枢密使时,以宦官充任,不置厅署,“其职掌惟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,若人主有所处分,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。”^{[4](卷五十八《枢密使》)}僖、昭二朝,宦官“杨复恭、西门季玄欲夺宰相权,乃于堂状后帖黄,指挥公事,此其始也”。^{[4](卷五十八《枢密使》)}

五代后梁为革除唐宦官专权之弊,开平元年(907)改枢密院为崇政院,以士人敬翔为使,“其备顾问参谋于中则有之,未始专行事于外也……至后唐而复枢密院,郭崇韬、安重诲相继领其事,皆腹心大臣,则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,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……枢密使带相印为枢相自后唐始。”^{[4](卷五十八《枢密使》)}胡三省亦认为“至后唐同光以来,枢密使任事,丞相取充任而已。”^{[5](卷二百八十九)}故而,枢密院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应在后唐同光年间。^[6]又据《新五代史》卷47《刘处让传》载,“唐制,枢密使常以宦官为之,自梁用敬翔、李振,至庄宗始用武臣,而权重宰相。”后唐时枢密使的职权已经很广泛,军事上,他们不仅参与军事决策,且拥有对中央和地方武官的任免权;^{[5](卷二百七十二)}政治方面,枢密使不仅参与决定国家方针大计,且可越

过中书门下直接处理国务,如《旧五代史》卷37《明宗纪三》即记载了当时枢密院直接处理国务的一个条奏;财政,更是控制中央财政核心——三司,并以此干预地方财政。因其权太盛,故后晋石敬瑭时加以限制,《资治通鉴》卷282《后晋纪三》云,“帝惩唐明宗之世,安重诲专横,故即位之初,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。”桑维翰时为宰相,以其兼之,说明了对枢密使权力的压抑。石敬瑭末年,甚至一度撤销枢密院,归其职于中书门下,直至少帝方复之,将军国大事、人事任免俱交给新任枢密使冯玉,枢密使重新显赫起来。^{[7](卷五十六《冯玉传》)}后汉枢密使开始有明确分工,“枢密使、右仆射、同平章事杨邠总机政,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。”^{[5](卷二百八十九)}后周时以枢密使专掌军事,遂使其成为最高军事长官,“后世因之,遂分为二,文事任宰相,武事任枢密”。因此,马端临云:“宋兴,始以中书与枢密对峙文武二柄,号称‘二府’。”^{[4](卷五十八《枢密使》)}史学界对五代时枢密使的研究很多,这里不再对此问题做深入探讨。虽然学者侧重点不同,但多数认为五代时期枢密使权力取得重大发展,枢密使地位的提高是五代中央官制最为突出的变化,并对北宋官制产生了影响。

与枢密使地位相呼应的是财政体系中三司使的形成及发展。唐初,尚书省户部为中央财政机关,下设户部、度支、金部、仓部四司,“掌天下土地、人民、钱谷之政、贡赋之差。”^{[8](卷四十六《百官志一》)}“于时封疆既广,经费尤多,亦不闻别分利权,改创使额,而军需取足。”^{[9](卷4)}但自玄宗朝,使职官开始大量涌现,“设官以经之,置使以纬之。”^{[10](卷十九《职官一》)}而财政使职的设置,破坏了原有的财政体制,盐铁、度支、户部等使职之地位却日渐突出,标志以这三个部门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逐渐形成。

三司之名,最早见于元和七年(812)五月。《唐会要》

收稿日期:2002-12-06

作者简介:李军(1976-),男,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,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经济史。

卷89《泉货》云：“(元和)七年五月，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、户部侍郎卢坦、盐铁使王播等奏：‘伏以京都市用，多重现钱——……臣等今商量，伏请许令商人于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三司，任便换现钱，一切依旧禁约……’”从之。但李锦绣认为，元和二年(807)“户部司的真正独立标志着三司的最终确立”。^[11](P143)前文提及，中唐以后先后创立了专理钱谷收支的度支使，专理盐铁之利的盐铁使，专理赋税征调的户部使，然而，自天宝年间杨慎矜、杨国忠等人“继以聚货之术，媚上受宠，然皆守户部、度支本官，别带使额，亦无所改作。下及刘晏、第五琦亦如旧制。自后亦以宰臣各判一司，不置使额”，^[12](卷一百四十九《职官志》)盐铁转运、度支、户部三司实际上自成体系，各有职司，又相互关联。唐后期，随着时局日益混乱及藩镇割据形势的加剧，中央政府可以征收赋税的区域也随之缩小，财政收入日渐减少，三司也开始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。

三司合一最早见于《资治通鉴》卷256唐僖宗光启二年(886)条：“四月，以郑昌图……判度支、盐铁、户部，各置副使，三司之事一以委焉。”郑昌图充任这一职务时间虽不长，但判(领)三司的职事名却固定下来了，天复年间卢光启、崔胤俱兼领过三司。关于三司使之名的出现，《旧唐书》卷20下《哀帝纪》载：天佑三年(906)三月，“制元帅梁王可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判庭支、户部事，充三司都制置使。”朱全忠“辞而不就”。三司使之名始于此。不过朱全忠在充任三司都制置使时仍兼领盐铁、度支、户部，表明三司请使并未完全取消，三司诸使只是隶属于三司都制置使而已。三司使使职的最终确定应在后唐。在此之前，各朝先后设立过建昌宫使、国计使、租庸使、内勾使等财政主管官员。但这些使职由于与中央政权的冲突及其自身的局限性，而纷纷宣告瓦解，“长兴元年(930)八月，以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，充三司使，班在宣徽使之下。三司置使，自延朗始也。”^[12](卷一百四十九《职官志》)当时的诏书云“会计之司，国朝重事，将总其使额，俾专委于近臣，贵使一时，何循往例，兼移内职，可示新规。”^[12](卷四十一《明宗纪七》)对设三司使做出了解释。此后，三司使遂成为五代、宋初掌管财政的重要官员。

三司使系统的种种变革皆出于同一目的，即由中央控制财权，收回地方对财权的支配。事实证明，这一变革颇见成效，三司使真正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要职。简而言之，三司使的具体职责就是为国家开辟财源，聚敛财富，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：征收与免除赋税，管理盐麴事务；对影响军备的牛皮大加征税；经常参与军事行动，或随军，或负责后勤，以便于粮草军需的调拨；参与管理马政事务；参与营田事务管理；参与管理府库及官员俸料；掌供祭祀所用一干物等；涉足吏部事务是五代三司使职权扩大的最明显表现。

宦官问题是促使唐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。由于唐中后期打破了宦官不能干预军政事务的限制，宦官得以控制朝政，他们的公开身份多是某种内诸司官员，这引起五代君主的警觉，他们改将这些使职交由士人充任，这也是唐、五代区别最为明显的地方之一。藩镇出身的帝王更相信自己出生入死的士人心腹，他们通过各种手段，或联姻，或赐婚，或养为义子的假血缘关系来密切彼此的关系，巩固统治基础。朱温在唐末曾勾结崔胤，大肆诛杀宦官，仅余少量供奉杂役的宦官，“除留宣徽两院、小马坊、丰德库、御厨、客省、閤门、飞龙、庄宅九使外，其余并停。”^[14](卷二十上《昭宗纪》)部分监军使也在地方节镇的庇护下得以幸免。但宦官犹存，却丧失了操纵政权的力量，内诸司使更多的由士人充之。或问，既然朱全忠既能铲除宦官，为何不除去内诸司使系统？盖因为他们的存在尚有一定合理性，君王还需要这些机构为其服务；另外，这一机制是历史发展长期形成的，非一朝一夕可以废除的，故虽不满宦官充职的内诸司使系统，却又不得不把它保存，而改由士人充职应为两全之策。

后唐“由于在国策上与后梁对垒，故此主张恢复以宦官为主的内诸司使。”^[15](P169)庄宗时宦官“殆及千人，皆给赐优厚，委之事任，以为腹心。内诸司使，天祐以来士人代之，至是复用宦者，侵于政事。”^[15](卷二百七十三同光二年正月庚戌条)明宗目睹庄宗由宦官而亡，故即位后，即罢诸道监军使，并大杀宦官，又下诏裁减内廷宫人、宦官，“教坊音声量留一百人，鹰犬之事，以备蒐狩，量留二十人，御厨膳夫量留五十人，其余任从所适，内诸司使有名无实者并从停废。”^[16](卷一百一十二《即位教文》)其后，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三朝均沿袭士人充内诸司使的传统，而未有大的反复。

由士人充任的内诸司使系统，在五代时形成了一套升迁秩序，并出现阶官化趋向。五代内诸司使的最高级官员为枢密使，其下为宣徽使，再下者为内客省使、客省使、引进使、四方馆使、东上閤门使、西上閤门使等，如《宋史》卷274《张保续传》：“开运二年(945)……以本官充西上閤门副使。明年，使荆南，复命转东上閤门使。……周祖革命……累迁引进副使……世宗即位，授西上閤门使。明年，进秩东上閤门使。从上征淮南……以功迁判四方馆事，就迁客省使。”再上则可到达宣徽使、枢密使。北图藏志章1186《吴廷祚墓志》较完整地反映出另一升迁途径：“(周)太祖……疇佐命之绩，授公庄宅副使，未年检转内军器库使，不逾时，迁大内皇城使，……显德初……充内客省使，由北院转宣徽南院使，从顾命也……旋授公枢密使……”这样，至少有两条途径可以达到宣徽使、枢密使这一任职高峰，多人挤在其中，竞争必然激烈，《资治通鉴》卷289后汉乾祐三年(950)十一月条：“武德使李业，太后之弟也，高祖使掌内帑，帝即位，尤蒙宠任。会宣徽使阙，业意欲之，帝及李后亦讽执政；(杨)

邠(史)弘肇以为内使迁补有序,不可以外戚超居,乃止。内容省使阎晋卿次当为宣徽使,久而不补;枢密承旨聂文进、飞龙使后赞、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宠于帝,久不迁官,共怨执政。”同事,《册府元龟》卷952《总录部·交构》部云:“后赞,飞龙使。乾祐未宰相杨邠、侍卫亲军使史弘肇执政,赞以久此未迁,颇怀怨望,乃与枢密承旨聂文进等构变。”《旧五代史》卷107《阎晋卿传》也说:“乾祐中,历閤门使,判四方馆。未几,关西乱…贼平,为内客省使。时宣徽使阙,晋卿以职次事望,合当其任。”据此,内诸司使升迁之停滞,是造成后汉酝酿政变之一大主因。《册府元龟》卷306《外戚部·专恣》亦云:“萧墙之变,自此而作。”

但我们却可以由此看出,后汉时业已形成一套为时人接受的升迁模式,后周加以继承。还有一种特殊情况,如《旧五代史》卷129《李彦积传》载:“(后周)太祖镇邠,置之左右,及即位,历绫锦副使、榷易使。世宗嗣位,以彦积有旧,超授内客省使。”因榷易使与内客省使相差悬殊,故以“超授”示之。

而低级使臣之间的升迁次序也在后周时趋于严谨。如,北图藏志3699《故宋内酒库使张秉墓志》云:“世宗(时)……擢授内弓箭副使,未逾旬,授弓箭库使,寻迁军器库使。”《宋史》卷257《李崇矩传》载:“显德初,补供奉官。从征高平,以功转供备库副使,改作坊使。恭帝嗣位,命崇矩告哀于南唐。还判四方馆事。”

可见,五代内诸司使出现阶官化的局面,为宋朝继承,形成阶官。

我们知道,设立使职官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它的灵活性与机动性,一旦任务完结,它们的历史使命也告终结,当然也有个别因政局的变动而消失的。五代时部分以前消失的使职得以恢复,并比原先使职的职责范围有所扩大。如武德使,唐昭宗天祐元年(904)废,后唐庄宗同光二年(924)扩充内诸司使的设置,该使当复置于此时,《资治通鉴》卷274同光三年(925)十一月云:“帝以武德使史彦瑋为邠都监军。”即可为证。又如采访使,《资治通鉴》卷268后梁太祖乾化元年(911)六月条:“上…乃以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。”其下胡注云:“唐之盛时,置十道采访使,河北其一也。自安史乱后不复除授。”又如营田使,也在后唐时恢复设置。此外,宫苑使、(内)作坊使、内园栽接使、八作使等唐末废除的使职均得以重设,并有具体职责。而租庸使、如京使、皇城使、左藏库使等在唐朝时非内诸司使系统的使职也并入其中,反映了五代时内使定义方面已趋于宽松。这可能是因

为后梁歼灭宦官,以士人充任内使而致使内诸司使系统逐渐丧失内廷意味的缘故。另外,五代时期使职的职能范围也较唐有扩大,如:担任监军,显德元年(954)四月,“客省使王峻帅师屯于关西。”^[7]卷十《后汉隐帝纪》)又如《宋史》卷271《张勋传》载:“周世宗征淮南……监光州军……迁内园副使。及征瀛,以为霸州兵马都监……拔扬州,以勋为兵马都监,迁毡毯使”;监护丧事,尚食使安友规、洛苑使曹守珩等俱出任过此项事务;工程营造,内衣库使齐藏珍因“奉诏修河,不于役所部籍,私至近县止宿,及报堤防危急,安寝不动,遂此横流。”^[12]卷一百一十三《齐藏珍传》)而被流放。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,职责扩大的同时它们还具有本身职能,如武德使,“后唐武德使本掌宫中事,明宗时,尝旱,已而雪暴,坐庭中,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,是其证也。”^[5]卷二百七十四同光三年十二月胡注)又如“(后唐庄宗)令宫苑使经营(宫殿)”,^[12]卷五十七《郭崇韬传》)后周显德四年,“斩内供奉官孙延希于都市,御厨使董延勋、副使张皓,武德使卢维昇并停职。时重修永福殿,命延希督役,止见役夫有就瓦噉饭以柿为匕者,大怒,斩延希而罢延勋等。”^[12]卷一百一十七《世宗纪四》)虽然他们尚有本职,然而职责的扩大使他们不再专注于本身职责,这也造成本职的慢慢丧失,最终在北宋时成为阶官。

部分使职可兼领外职,也造成其本职的衰落。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一载:“开宝中,教坊使卫某年老,当补外,援后唐故事,求领小郡。太祖曰:‘伶人为刺史,岂治朝事,尚可法耶?第令于本部中迁叙’。乃以为大常太乐令。”说明后唐有领外职的事例。《新五代史》卷5《后唐庄宗纪下》载,“同光二年(924)五月…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,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。”即可为证。它固然是反映后唐授官之滥,更是内职可领外官的反映。

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,五代时期使职官大约有六个特点,即政治格局,枢密使取得至高权威;经济体系,三司使获得核心地位;内诸司职官多由士人出任;形成升迁秩序,出现阶官化趋势;部分唐朝消失的使职官得以恢复;部分内职可领外官。它反映了五代各朝在大乱之后,并未抱残守缺、因循守旧,而是尽可能的摸索一条适合自身,适合历史发展的新路子。当然,由于时间及自身力量的有限性,他们不可能彻底推翻旧的制度,而推行一条全新于唐的体制。最好、最方便的当然是将旧的与新的结合,即将三省体制与使职差遣结合起来,最终形成了枢密使掌军事,三司使掌财政,中书掌行政的局面,对北宋政治、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吕思勉. 中国制度史[M]. 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8.
- [2] 费 . 梁溪漫志[M]. 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 1986.
- [3] 王鸣盛. 十七史商榷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59.

- [4] 马端临. 文献通考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6.
- [5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5.
- [6] 杜文玉. 论五代枢密使[J]. 中国史研究, 1989年1期, P63-70.
- [7] 欧阳修. 新五代史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7.
- [8] 欧阳修. 新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7.
- [9] 李焘. 续资治通鉴长编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9.
- [10] 杜佑. 通典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8.
- [11] 李锦绣. 唐代财政史稿(下卷)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0.
- [12] 薛居正. 旧五代史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7.
- [13] 唐长孺. 唐代的内诸司使其演变[J]. 山居存稿[C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9.
- [14] 刘昫. 旧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5年.
- [15] 赵丽乐. 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[M]. 中国台北:文史哲出版社, 1994.
- [16] 董诰. 全唐文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0.
- [17] 王钦若. 册府元龟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9.
- [18]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. 北图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[M]. 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89.
- [19] 脱脱. 宋史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7.
- [20] 江少虞. 宋朝事实类苑[M].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1.

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issaries in the Five Dynasties

LI Jun

(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:100089)

Abstract: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, the emissary developed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: Shumishi and Sansishi had been the key official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arts, the emissary were mostly taken charged by the warriors; and had an official rank; some emissaries that had disappeared regained. So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y them.

Keywords: The five dynasties; The emissary shumishi sansishi ; Official rank .